



“纪念全面抗战爆发 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高士华 许欣舸

2017年7月8—9日,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纪念全面抗战爆发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日本、俄罗斯、英国、韩国、澳大利亚、丹麦的1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主席团秘书长李培林研究员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研究员,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陈谦平教授,剑桥大学顾若鹏(B. Kushner)教授分别致辞。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研究员主持开幕式。

李培林在致辞中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会议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对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期待参会的海内外学者,在交流抗日战争研究成果的同时,深入探讨抗日战争研究的未来课题与发展方向,以纪念全面抗战爆发八十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思考战争、和平与发展问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和平进步贡献学者的智慧。

王建朗在致辞中对抗日战争研究队伍的壮大,尤其是更多青年学者的参与表示欣慰。他认为抗日战争研究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有三:即抗战本身所具有的历史重要性、抗日战争对今天社会的高影响度以及抗日战争研究的可开拓性。具体而言,第一,抗日战争是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它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是中国由衰弱走向复兴的重要转折点。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影响了世界的走向,反法西斯力量的胜利使人类的进步与文明免于毁灭。第二,抗日战争是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件。战争中所产生的问题,战后所形成的地区国际秩序,战后处置的成就与缺陷等问题,至今仍产生着影响。战争遗留问题、历史认识问题仍是影响当今相关国家或地区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探究历史缘由,关注当下发展,也是我们从事抗战研究的重要动力。第三,抗战史研究仍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仍有新的领域亟待我们去开拓,即便是那些看似研究成果比较充分的领域,事实上仍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和推进。

陈谦平认为,抗日战争是以国共合作为政治基础的全民族抗战,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阶段。通过十四年抗战,中国收复了自甲午战争以来被日本侵略的广袤国土,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参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顾若鹏从欧美学界研究现状出发,谈了三点看法:第一,在欧美学术界,对亚洲在二战史中的地位与作用仍关注不够,需要通过和亚洲学术界的相互交流,更好地了解二战中亚洲的历史;第二,现



在欧洲不少从事亚洲研究的学者着重利用英美等国的材料,这容易受到西方视角的影响,从而影响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因此需要进一步挖掘新的史料,以便对中国历史有更加清晰的认识;第三,受语言的限制,在欧美从事亚洲历史教学的教师越来越少,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共同研究,取长补短,推动研究的深化。

有五位学者做了主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鹏的《理解抗战必须正视抗日战争中的两个领导中心》、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的《战后中国:全球秩序的形成与东亚国家的内部动荡(1945—1949)》、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维开的《〈抗日战史〉的前世今生》、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玛玛耶娃(N. Mamaeva)的《苏联与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苏联的对华政策》、韩国新罗大学教授裴京汉的《中国抗战与韩国独立运动——“长期抗战”与虹口公园爆炸事件(1932年4月)》。张海鹏对国共两个领导中心观点的阐述、米特对战时战后联系的重视、刘维开对《抗日战史》出版来龙去脉的追踪、玛玛耶娃对战时苏联对华政策的深入解析、裴京汉对虹口公园爆炸事件影响的介绍都颇有新意。

在接下来的分组讨论中,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抗日战争的诸多方面展开了深入研讨。由于提交大会的有80多篇文章,难以一一提及,故本文只围绕一些专题,进行重点介绍。

一、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前后。不论是九一八事变还是七七事变,都是抗战学界研究的重点对象,涉及这个时段的论文共有11篇(王希亮、徐勇、殷燕军、黄自进、范德伟、张皓、臧运祜、侯中军、刘志鹏、董清平、岩谷将)文章,是本次会议比较集中讨论的问题,这其中既有对中日双方状况的分析,也有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原因、计划、过程等诸问题的研究。王希亮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军权失衡、失控及膨胀的历史轨迹——从“皇姑屯事件”到“二二六事件”》、徐勇的《日本侵华决策计划性与必然性问题再探讨——以日方史料为中心》、殷燕军的《从九一八到七七:“独走”还是有计划的国策战争?》三篇文章,力图还原日本军政高层侵华战略决策的全过程,探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性与必然性。三位学者都认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绝非“偶然”,是日本军权从失衡、失控走向膨胀的必然结果。

黄自进的《重探中日战争爆发的时代背景:以20世纪30年代两国的华北政策为中心》、张皓的《“以退为进,先稳基点”:蒋介石对华北事变的处置——以与何应钦的分歧为中心》、臧运祜的《蒋介石与1935年上半年的中日亲善——以蒋氏日记为中心的考察》、鹿锡俊的《适得其反:西安事变后日本对国民政府“容共联苏”的阻遏与促成》、袁成毅的《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日本侵华军事战略之研判》、隆鸿昊的《试论七七事变前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扩张与列强的应对》、岩谷将的《从卢沟桥到上海——再论中日战争初期的展开》、侯中军的《战略与策略的平衡抉择:再论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应对方略》等八篇论文,都与从华北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中日之间的战和有关。日本为什么选择在华北继续动武,走向全面侵华?其内部分歧的实质是什么?中国方面处于什么样的考量决定不再退让,武力反击?其真相一直没有彻底弄清。这八篇论文,在相当程度上深化了对这一时段的研究。日本很多人一直强调日军个人和小集团的犯上,即所谓的“下克上”,这经常会被认为其实质是为当时的日本政府、军部和天皇开脱战争责任,而过分地强调发动战争的偶然性,也同样容易引起人们一样的联想。不过,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确实应该深入讨论,因为真理越辩越明。

二、外交与国际关系。这部分也是本次会议讨论比较集中的领域,共有崔巍《1936—1937年英日涉华问题谈判的历史再考查》、耿密《抗战期间英国两次对日妥协与国民政府之应对》、姚江鸿《战时中国朝野对英国社会的观察与认识——以访英团为中心的考察》、维尔琴科(A. Verchenko)《1938—1939年苏联对华信用贷款与孙科代表团》、乌里娅诺娃(S. Ulianova)《苏联媒体对1937年

中国事变的反应》、陈开科《档案里的历史真相：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几个问题》、贾钦涵《抗战时期美国战略情报局与中共的军事合作》、何铭生(P. Harmsen)《“厨子太多坏了汤”——1937年11月布鲁塞尔九国公约国会议北欧国家的参与》、左双文《国民政府战时对缅关系及对印缅民族独立运动的关注》、金志勋《1945年前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韩半岛构想与韩国》、刘萍《“白尔丁号事件”与法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废除》、郑炯儿《中苏“友好同盟”的始末与美国的影响》、段瑞聪《1948年张群访日之分析》13篇论文,不仅涉及美、英、苏、法等大国,对北欧和中国周边国家也有关注,议题广泛、深入。1945年二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作为抗日战争研究的延伸,也应该加强研究,段瑞聪对张群1948年访日的分析,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三、战时国内政治、军事。政治无所不在,战时也是如此。从政府、军队到社会、学校,国民党都加强了政治控制,这其中当然有国民党为争取抗战胜利的考量,同时其也力图把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争取一党独大,在国共竞争中占上风。涉及国民政府、国民党和国共关系的论文有王春林《“中央与东北全体之主张”:西安事变后刘尚清的主皖》、张瑞德《中国现代史上的侍从室》、周勇《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决策与实施》、吴淑凤《蒋介石日记中戴笠的缥缈身影——以军统局打击汪精卫政权成立为例》、刘大禹《论蒋介石与战时行政三联制》、王凤青《中共参政员与国民参政会(1938—1945)——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视角》、徐文彬《抗战时期台湾义勇队与国共两党关系》、沈惠芬《世界大战下的中国侨务:以抗日战争后期福建救护难侨工作为中心》、林桶法《台湾地区战时的捐献档案——兼论忠义献机劝募运动》、陈钊《左右之争与大学校政:陈立夫、徐诵明与西北联大法商学院的整顿》、张楠《战时大学与政治角逐:山西大学的党派组织与国共斗争(1939—1949)》、朝泽江《鄞县县政府对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调查与上报》,共12篇。抗战前期的国民党政权,在抗战大潮影响下,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因为有了这种支持,前期的国民政府运作比较克制,很多老百姓都是“相忍为国”,到了后期,国民党的各种问题如贪腐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暴露,很多问题不仅对当时,对战后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国民党彻底丧失人心。

杨东《战时中共关于“全面抗战”的概念话语表述》、陈先初《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批判和新民主主义话语权的确立》两篇论文涉及国共两党话语权的竞争。中共以“全面抗战”作为自己的旗帜,理论上坚持宣传统一战线,在敌后极其不利的残酷环境中与日军周旋,建立根据地,根据地干部廉洁奉公,赢得了人民的拥护,这些都得到了老百姓的高度评价,也更加拥护中共的主张。

军事方面的论文有潘泽庆《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军事战略转变新论》、洪小夏《1938年广西南岳军事会议述略》、冯超《抗战时期项英与刘少奇的战略分歧》、龚喜林《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员的征募与补充》、张仰亮《抗战期间国民党游击战的困境、因应与走向——以中条山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赵文强《土顽武装、旧式军官与守土抗日——洛阳保卫战若干史实问题的再探讨》共六篇,对国共都有涉及。潘泽庆一文探讨了中共的战略转变,指出及时审时度势,做出战略调整,是中共敌后根据地建设成功的保证。冯超一文涉及中共内部分歧,分析了项英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张仰亮一文以中条山根据地为中心,指出不能彻底发动群众是导致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失败的根本原因。

四、战时社会众生。战争状态下的各个国家、各个阶层的社会生活,鲜有安定的状态。不管是在大后方、敌后还是敌占区,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不仅影响了当时,在战后相当长时间也未能消除,给当事者及后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值得深入研究。

这部分论文涉及战时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有李金铮《民族尊严:从5部日记看卢沟桥事变与中国知识精英之反应》、郑会欣《战时后方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贫困化——以几位著名教授的日记为中心》、黎志刚《第二次中日战争时期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初探》、王余辉《从精英思想走到生活

世界——抗日战争与“屈原爱国”观念的实现》、薛毅《世界矿难之最：1942年本溪煤矿大爆炸述论》、王林《论世界红十字会在全面抗战初期的慈善救济》、游海华《战火燃烧的青春：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考察》、宋青红《宋美龄与淞沪抗战》、赵军《“英雄”未满，“凡人”以上——从〈审问笔录〉再考中西功其人其事》、许效正《抗战时期佛教护国救世思想述评》、金丸裕一《危机下的日中基督教关系史——“中国认识”的诸相》、尹辉铎《伪满洲国国军内当地人的协作和民族矛盾》、汪效骊《精神动员的仪式化现场：抗战时期的国民月会研究》、吴敏超《抗日战争与新西兰华侨妇女：从临时难民到落地生根》¹⁴篇文章。这些文章各有侧重，特色鲜明，探讨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在战时是如何变化的，饶有新意。

小林元裕《物资争夺战的日中战争——以伪造法币工作为中心》一文，讨论的是日本伪造法币问题，假币问题曾经在战时给根据地的人民造成很大困扰，此文有助于了解和认识日本如何不择手段地对华掠夺、破坏根据地的人民生活。

到目前为止，根据地、沦陷区、大后方等已经成为比较固化的概念，应该超越这些概念，进行跨界研究，这样一些原来没有关注到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产生新的课题，从而丰富和深化我们对抗日战争的认识。

五、根据地建设及其作用。敌后根据地也是抗战研究的重点领域，本次会议共有六篇论文选人：黄道炫《刀尖上的舞蹈：弱平衡下的根据地生存》、把增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勤务及其实施》、祁建民《近代日本的“防共回廊”计划与大青山根据地的战略意义》、朱东北《均衡式代理：抗日根据地工会角色与乡村社会变动》、丸田孝志《毛泽东形象的形成——抗战时期传说的成立与展开》、李军全《论中共革命与乡村民俗之关系：基于华北中共根据地春节文化的思考》。中共建立的敌后根据地，意义重大，不仅有效地支持了敌后战场，抗击了日本侵略，其局部执政更是给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提供了经验，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都值得深入研究。

黄道炫的论文比较受关注。他认为，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逐渐把主要军事力量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恶劣的形势下，能否继续在环境艰苦的敌后坚持，“是关乎中共生存能力的大考”，从结果来看，中国共产党通过了这场考试，取得了在敌后生存发展的好成绩。“由于中共在敌后的努力，让日军在中国的占领始终如履薄冰，占据优势局面的日本却无法打破看起来摇摇欲坠的平衡，这是他们不得不痛苦面对的事实。在中国陷入泥沼的日军，随着时局的演变，越来越龟缩到堡垒之中，到抗战末期，这样的场景于他们而言已成常态”。

祁建民的论文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扶植伪蒙疆政权，要将其作为建立庞大“防共回廊”的前沿基地，而中共开辟的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团结蒙汉人民共同抗战，不但沉重打击了驻蒙日军和伪蒙疆政权，而且有力牵制了日本“防共回廊”的建设和对苏作战部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六、战犯审判及历史认识问题。这部分共有五篇文章：向隆万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侵华罪行的审理》、周桂香的《从抚顺战犯管理所原日本战犯的认罪看中日战后和解——以原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成员三尾丰为例》、顾若鹏的《在中国的战争审判与历史认识之争：中日关系与战后的争议》、久保亨的《日中战争史研究之现状与日中关系》、斋藤一晴的《为了历史对话的共同历史教材·授课交流——日中战争爆发80年的尝试》。这些文章各有侧重，其中顾若鹏从日本帝国崩溃角度分析战犯审判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久保亨认为历史认识问题正在不断成为刺激中日双方民族主义的材料，需要双方谨慎处理的呼吁，斋藤一晴参加中、日、韩共同教科书编撰的个人体验值得我们重视、思考。

另外，刘本森的《英美学界的卢沟桥事变研究》、聂洪萍的《英国学术界抗日战争研究的发展》

和波尔托纳克(S. Poltorak)、佐托娃(A. Zotova)的《关于第二次中日战争科学文献分析——立足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材料》三篇文章给我们带来了英美和俄罗斯的相关研究信息和分析。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样的关注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避免闭门造车,毕竟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对国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和了解,例如有很多问题不止发生在中国战场,像杀害平民问题、战俘问题、细菌战、化学战、战场供应问题、所谓通敌“合作”问题等,在其他战场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相信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比较研究,会得出更为深刻的结论。

本次学术讨论会的目的是为了纪念全面抗战爆发八十周年,继往开来,会议收到了大量来稿,盛况空前,是一次抗战研究成果的大检阅。会议主办方也做了精心的准备,近20位外国学者欣然与会,港台学者踊跃参加,很多论文题目新颖,特别是国内年轻学者的水平越来越高,显示了长足的进步,值得肯定。

同时,我们也发现,我们还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有些境外学者也指出了这一点。在研究方法上,应该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做出更多的新尝试,视野要更加开放,要超越中国一国的视角,注意中国抗日战争的横向联系和比较,从各国对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局的高度上,来把握这场战争。

在史料使用上,应该更多地利用日文原始资料,如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资料。本次会议理论分析战时日本的有宋志勇《满铁调查部“支那抗战力调查”述评》、潘洵《关于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的几个问题》、罗运胜《侵华日军的细菌战理论:以石井四郎为中心的考察》、许晓光《试析日本近代民族扩张的“理论依据”——民族关系中的霸权主义思想批判》四篇论文,但这样的文章还是少了些,也应该有更深入的讨论,期待有更多的高质量论文问世。

在闭幕式上,北京大学教授徐勇、杭州师范大学教授袁成毅、台湾辅仁大学教授林桶法、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段瑞聪作小组总结。日本信州大学教授久保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维尔琴科、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研究员何铭生、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张瑞德、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会欣、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希亮分别发言,大家纷纷表示这是一个难得的学术交流机会,一定要借这次会议的东风,把抗日战争研究推向深入。

[作者高士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许欣舸,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莹莹)